

津门酒文化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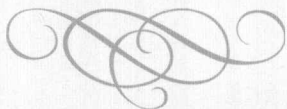
◎岳明 李凯 / 主编

天津老烧锅

张博 著

图香酒韻沽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津门酒文化丛书

◎岳明 李凯 / 主编

天津
老烧
锅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张博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津老烧锅/张博著.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7.9
(津门酒文化丛书/岳明, 李凯主编)

ISBN 978 - 7 - 5309 - 5022 - 7

I . 天… II . 张… III . 酒—文化—研究—天津市
IV . 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7960 号

封面《沽韵酒香图》作者 魏玖来

天津老烧锅

出版人 肖占鹏

作者 张博

选题策划 于长金

责任编辑 于长金

装帧设计 郭亚非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90 × 1240 毫米)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25

插 页 2

书 号 ISBN 978 - 7 - 5309 - 5022 - 7

定 价 20.00 元

津门酒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岳 明	李 凯		
副主编	赵恩来	张 博		
编 委	谢树源	刘栋清	韩晓东	谭春雨
	史 滨	黄 敬	耿卫华	

序

张博博士的《天津老烧锅》一书正式出版了,我作为他的同事,很高兴能够为这部书的出版写几句话。

烧锅业是濒临河海的天津城市传统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沿海临河城市的特色。近代以后天津生产的高粱酒、五加皮和玫瑰露等酒品,大量出口海外,构成出口贸易的一大亮点。但遗憾的是,除了有数篇介绍性或回忆性文章外,并未开展深入研究,更没有一部探讨和研究天津烧锅业发展的学术专著问世,这与烧锅业在天津、华北,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形成这一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视野的局限和史料的相对零散。近年来,城市史、社会生活史研究不断深入。张博博士多年来一直关注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相关研究动态,特别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发展和演变。他利用三年的时间,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和近代文献中,钩稽出一批天津烧锅业的资料。有的资料还相当珍贵,比如天津酒业同业公会信件,这是当年天津烧锅业的行业组织内部的通信记录,非常详细地反映了当年天津酒业公会和天津烧锅业的有关史实,对于我们认识和梳理近代天津烧锅业的发展很有裨益。张博博士在掌握了一定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基于丰富的资料,撰写了这部学术专著,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项研究的空白。

在关注传统文献的同时,该书作者注意从民间收藏资源入手,通过一些实物资料来再现天津烧锅业发展的侧面,这有助于对一些文献资料不足的相关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张博博士在一些旧物和旧书市场上专

心寻找天津烧锅业的老广告、老商标,并多有斩获,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资料图片等为本书增色许多,并增加可读性和可视性。

从研究方法上看,该书作者采用了多种方法对天津烧锅业发展史进行探讨。近代天津烧锅业发达,是学术界所共知的,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究竟在近代中国酒货出口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却没有一个详细的数据加以说明。该书作者利用大量的海关年度统计报告,对近代天津口岸酒货出口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并作了颇有说服力的量化分析,为天津本地酒货出口的数量提供了可靠的说明,进而提出了天津口岸是近代中国最大的酒货输出口岸的论点。同时,作者对相关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勾勒和分析,让人们对天津烧锅业的发展历程有了系统且更为直观的认识。

作为一部反映行业史的专著,该书作者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行业的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观照。清代档案文献和其他文献相对匮乏,该书作者另辟蹊径,从诗文中找出大量相关的史料,并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对清代前中期城市水资源的分布与传统手工业的布局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当然,作为一部学术专著,该书还存在一些不足,如从文化意蕴上对天津烧锅的分析,从民俗和生活方式等角度来看,天津烧锅业发展的背景等课题尚需深入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利民

2007年9月1日

目 录

绪论/001

第一章 古代天津酿酒业发展概况/022

第一节 酒的起源与中国古代酿酒业概述/022

第二节 漕运与古代天津地区经济的发展/026

第三节 清政府对酒业的宏观调控与华北酿酒业的发展/032

第四节 城市水资源与古代天津烧锅业的布局/036

小结/044

第二章 近代天津酒货贸易统计分析/047

第一节 近代天津口岸酒货贸易变动趋势/048

第二节 天津口岸在近代中国酒货贸易中的地位/059

第三节 天津酒货贸易构成分析/070

第四节 天津本地烧锅业产能及烧药酒构成分析/078

小结/088

第三章 政策变迁与近代天津烧锅业在逆境中发展/089

第一节 屈辱与机遇并存:晚清时期的天津烧锅业(1860~1911)/089

第二节 困境中的崛起:北洋政府时期的天津烧锅业(1912~1928)/108

第三节 逆境中的辉煌:国民政府时期的天津烧锅业(1928~1937)/117

第四节 走向衰落:日伪统治时期的天津烧锅业(1937~1945)/119

第五节 濒临绝境:国民政府接收时期的天津烧锅业(1945~1948)/128
小结/130

第四章 近代天津烧锅业的经营活动/133

第一节 天津烧锅业的品牌保护意识/133

第二节 近代天津烧锅业的品牌宣传意识/142

第三节 津酒市场网络的形成/151

小结/158

结语/160

附录/163

参考文献/218

后记/224

绪论

一、学术史回顾

近代以降,直沽烧酒和玫瑰露、五加皮等露酒和药酒一直是天津口岸出口的大宗土货。然而,与其在中国口岸酒货贸易中的地位相比,关于天津酿酒业发展史的研究成果略显单薄,尤其是古代天津酿酒业发展的情况,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有关研究状况上看,还没有一部天津酿酒业发展史的专著问世。关于天津酿酒业发展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对天津大直沽地区酿酒中心的宏观性描述上,兼及天津地区的发展概况;另一方面则为个案的烧锅历史状况。从著述的性质来看,纯粹的学术论文较少,这些研究成果多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和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上刊载。此外,天津媒体曾经举办过关于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地区历史文化征文,并结集出书。^①下面,笔者就天津酿酒业宏观研究成果和个案烧锅的研究成果分别加以说明。

天津大直沽地区作为天津较早的居民聚落,一直为研究天津史的学者和文史专家所关注。天津民间流传着“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的谚语。因此,在各种文史资料和报纸上,多有学者和文史专家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问题撰文探讨。而关于大直沽地区则有“古庙、烧酒、台子高”的说法,彰显了大直沽地区作为清代以来华北地区酿

^①目前笔者见到两本征文和研讨会的集子,一本为《直沽探胜集》,另一本为《追寻大直沽》。这两本文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大直沽地区酿酒业的发展,为笔者梳理天津烧锅业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不少帮助。

酒中心的地位,这一地区也曾经有残缺的酒坛子出土。论及大直沽,专家学者们多会谈及直沽地区的特产——直沽高粱酒。

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非常关注家乡的历史,他在一篇论述大直沽地区历史文化的文章中指出,大直沽酒的特产,当然是与历代漕运直接关联的,只有“卸粮码头”,才便于因粮造酒。制烧酒的高粱,来自渤海那边的辽东,仍然离不开海运盛行的历史。^①这段文字虽然不长,但透露出以下两个信息:一是漕粮海运不仅带动了天津经济的发展,同时为酿酒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二是当时天津造酒的原料高粱来源于辽东半岛。周骥良先生在其文章中,对大直沽白酒产生和发展的脉络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指出天津白酒最早在元代已经产生,其产生的原因是往来南方与天津之间的船夫在完成漕粮转运任务后,要打牙祭,“烧酒当然是必不可少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直沽烧酒在清代前中期就已经享有盛名。周骥良先生还对近代天津烧酒的产量进行了估算,指出,当时天津烧酒总产量在3300万斤左右。一般烧锅的年产量在30万斤左右。该文中对天津酒业在国外影响提出了新的史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校级军官在负伤养伤时,才配给一杯“直沽老白干”饮用。该文还对天津烧锅的最终归属提出了重要的见解,他指出,当位于天津西沽地区的天津酿酒厂成立后,分散在不同地区的九家小酒厂并入了天津酿酒厂,并继续制造直沽高粱酒。^②林开明先生则在其文章中指出,20世纪初年,大直沽地区已经具有至少14家烧锅,如义聚永、义丰永和永顺祥,等等。^③赵宝鑫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大直沽地区的烧锅业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鼎

①周汝昌:《直沽的喜讯》,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直沽探胜集》(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六辑),1994年版,第7页。

②周骥良:《东庙与大直沽白酒》,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直沽探胜集》(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六辑),1994年版,第30~33页。

③林开明:《历史上大直沽的一次空前劫难》,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直沽探胜集》(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六辑),1994年版,第51页。

盛,这一地区生产的高粱酒、玫瑰露和五加皮等,最高年产量约1000万斤,其中销往上海、汕头、福州、广州约700万斤,销往日本、香港地区和南洋约300万斤。他在文章中还对20世纪20年代大直沽地区烧锅勇于开拓南洋市场的情况作了介绍。^①李可家先生则对直沽酒的另一个重要原料水资源进行了描述,他指出,大直沽酒质好的原因,除了优选原料和制造工艺娴熟外,大直沽地区的水资源丰富,水质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②

在众多的回忆类文章中,两位曾经在酒业公会供职的先生撰写的文章尤其珍贵。吴仲鲁先生于1936年至1945年在天津酒业同业公会供职,他在文章中回顾了直沽酒的原料和特点、烧锅的缘起和产量、直沽酒的经营、直沽酒商的劳资情况、关于大直沽四大坑的传说等问题。根据吴仲鲁先生回忆,大直沽地区的3000户居民中,半数从事酿酒业。当时天津烧锅业使用的高粱来源有东北高粱和河北高粱两种。他指出,当时的烧锅平均年产量为15万斤到20万斤,由此,天津酒业每年的产量可达1000万斤以上,旺时可达1500万斤。吴仲鲁先生提出了津酒中药酒销往海外的原因,他认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量的华工奔赴战场有关。在开拓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当时称之为南洋),天津烧锅业中的出口酒商大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此外,对于烧锅业的起源问题,吴仲鲁也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在文中,作者还对当时的烧锅业主普遍缺少开拓精神的现象提出了

^①赵宝鑫:《我所知道的大直沽》,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直沽探胜集》(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六辑),1994年版,第88~89页。

^②李可家:《家乡好——记大直沽街五十年代概况》,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直沽探胜集》(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六辑),1994年版,第108~109页。

批评。^①而董梦松先生曾经担任过天津酒业协会的副主委,他根据自己了解的天津酒业的历史资料,从天津酿酒业的兴起、天津酿酒业的鼎盛时期及传统名酒、天津酒的外销渠道、天津酒直接开辟国外市场的经过、天津酿酒业的衰落以及解放后天津酿酒业的变化等六个方面,对天津酿酒业的发展沿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溯。其中,董梦松先生对天津酿酒业的外销市场和大直沽酿酒业兴起的原因等问题的论述非常值得注意。^②赵宝鑫先生在《大直沽的商业老字号》一文中论及了这一地区烧锅业的著名字号。值得注意的是,该作者指出,烧锅业成为大直沽的经济支柱后,带动了这一地区商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时酒业的附属行业——主要是兽力运输业以及打坛络、糊酒篓、踩曲和卖酒糟等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③

此外,一些致力于天津史研究的学者对于天津大直沽地区的酿酒业发展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罗澍伟先生在其文章中较为详细地研究了天津酿酒业发展传承的历史脉络,并对造酒原料的高粱来源以及对津酒质地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他还就大直沽地区烧锅业的师傅们将津酒技术传往日本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说明。^④胡光明先生以档案资

①吴仲鲁:《天津特产直沽酒》,《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5年第4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6页。南开大学馆藏的文献中,有一部《天津酒业公会信件》,其中收藏有吴仲鲁先生致当时的酒业公会主席王荫堂的亲笔信函。作为天津酒业发展的见证人,吴先生的这篇文章可信度相对要高一些,当然由于历史局限,该文中也有个别地方值得探讨。

②董梦松:《天津酿酒业发展沿革》,《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赵宝鑫:《大直沽的商业老字号》,政协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天津市河东区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99年版,第95~97页。

④罗澍伟:《说说历史上大直沽的酒》,《追寻大直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7页。

料为依托指出,1917年前,天津酿酒业的全年产量为600余万斤,绝大多数产于大直沽地区。其销路主要为闽广地区和南洋一带。由于津酒的畅销,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假冒津酒的情况,据此,天津酒业公所致函天津总商会,由总商会出面,与相关地区的商会协调,解决假冒津酒的问题。此外,该作者在文章中,还对天津烧锅业维护产品质量、防止津酒销量提升后质量下降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该作者主要使用的是天津商会档案,因此,文中的内容可靠度较高。^①阳光在其文章中对天津酿酒业起源于元代提出了质疑,但肯定津酒至少不晚于明朝永乐年间。他在文章中指出,清代乾嘉时期,天津的酒业已经初具规模。^②王维刚先生从大直沽地区的水资源情况入手,引证天津烧锅业老人的口述资料,对大直沽地区烧锅分布的特点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大直沽地区形成了“八湾六塘”的水源地地表分布特点,直接影响到了大直沽烧锅业的分布,每家烧锅都会挖井取水,而且每口井附近都有护井树,保证了直沽高粱酒的醇香清冽,并认为大直沽酿酒业早期就具备了生态平衡的意识。^③

①胡光明:《南洋喜饮直沽酒》,《追寻大直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154页。

②阳光:《大直沽的酿酒业》,《追寻大直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159页。该作者在文史援引了元代《接运海粮官去思碑》中的记载:“直沽素无佳酝,海舟有货东阳之名酒者。”他认为,这只能说明天津曾经买过名酒,却不能说明天津元代就已经能够生产酒。显然,该作者对这句话的解读存在着误解。从含义上说,这段文字分为两个部分,前半句就讲直沽地区没有好酒,却没有讲直沽地区没有酒;后半句讲大直沽地区的居民要买东阳酒。在一些明清时期出版的酒史著述中,东阳酒指的是沧州酒。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大直沽地区已经有了酒,但酒的名气还不大。再从这段碑刻全文来看,是大直沽地区的居民为了感谢元代接运海粮官的离开而写的纪念性文字,既然要送这位为民造主的官员离开,要送有名的酒是无可厚非的。

③王维刚:《水灵灵的大直沽》,《追寻大直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169页。

与宏观地研究天津酿酒业发展史的成果相比,天津烧锅业个案的研究则略显薄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少数几家企业上。其中,关于天津著名烧锅广茂居的文章有一篇,发表在政协文史资料和《津门老字号》上。在这篇文章中,该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观点。如该文指出,广茂居创始于乾隆年间,其酿酒技术系由南方客商所授,这符合当时天津作为移民城市的特点。该作者指出,广茂居在创办伊始,就以各色露酒和药酒为主,并行销海内外。清道光初年,广茂居就已经颇具规模。晚清时期,广茂居的规模急剧发展,拥有门市、柜房、客房以及栈房三处,职工达到了50多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营者善于利用广告效应,遂使该企业在清末民初一度称雄天津烧锅业。但由于后来的经营者经营理念陈旧,企业发展逐渐萎缩,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茂居宣告倒闭。该文作者还详细地描述了当时天津露酒、药酒和冬菜等制作方法等。^①此外,对于其他一些烧锅,也有人撰写文章进行探讨。如对于大直沽地区的义聚永,其后人就撰文对刘香久(义聚永的经理)到南洋推销津酒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②

关于近代天津酿酒业的发展,学术界与文史学者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关于古代天津酿酒业的发展规模和概况,两者则有很大的分歧。天津的文史学者多认同天津酒业发轫于元代,盛于清代前中期,而学术界对天津酿酒业发展规模的研究则稍显谨慎。有学者在谈及清代前期酒货贩运的商路时指出,这一时期,已经有海路贩运酒的记载。在个别案例中,该作者指出,嘉庆道光年间,福建商船就开始到天津进行贸易,而在返程

^①王寿岩:《二百年老店——广茂居》,《津门老字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219页。另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02年第1期,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7页。

^②刘炳铨:《刘香久与大直沽的酒》,《追寻大直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162页。

时,往往要装酒回去。需要指出的是,该作者认为,天津不是产酒的地区,天津的酒恐怕也多是别处运来的,并举出道光六年浙江镇海县一商船“自镇海装酒放洋,往天津交卸”的例子,以证实其观点。^①当然,这个问题尚需深入研究,因为该论者也不敢肯定自己的观点,只是说有可能是从外地输入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的作者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当时从外地输往天津的酒还有产自东北地区的,同时,该作者也指出,清代前期还有自天津、辽东南下的北洋船将醇酒、烈酒运往上海。^②另外,从天津民间俗语“天津螃蟹镇江酒”中,我们也能够肯定地说,清代前期还是有大量南方的酒输入天津的。但天津当时究竟有没有酒,似乎不必争论,前文已经举出多篇文史专家和研究人员文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限于篇幅,本书仅就津酒发展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全国性和其他区域酒业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不再回顾。在本书的部分章节中,仅就可能涉及到的问题,有选择地吸纳全国性和其他区域酒业发展的有创见性的研究成果。

二、史料分析

应该说,上述前人研究成果,既是本书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笔者寻找津酒史料和认识津酒发展史的重要渠道。既然津酒在近代中国酒类出口中占有着巨大的份额,那么关于津酒的历史文献有多少呢?这些资料

①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页。

②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655页。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其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酒的地位呢？为此，笔者翻阅了从宋代到清代的各种酒史专著，并把晚清以来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在阅读元明清三代的各种酒史后发现，这些文献较少有关于津酒的著名品牌直沽高粱酒和玫瑰露酒、五加皮酒、史国公药酒等的记载，这可能与天津城仅有600年的历史有关。所幸，在汗牛充栋的近代文献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关于津门酒业发展状况的史料。如果按照文献的性质划分，有关天津酿酒史的资料，大体可以分为档案及档案汇编类、地方志和古代文献类、民国期刊类、民国报纸类、民国图书类、文史资料类以及外文统计文献等几大类。在加以甄别后，笔者在本书中有选择地利用上述各种文献资料。下面，兹就笔者所见的津酒史料按照类别逐一加以说明。

（一）档案及档案汇编类。天津档案馆馆藏丰富。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天津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工商业联合会等几个部门联合开发了天津商会档案，共出版了5辑10本《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这部系列的档案汇编自1902年开始，到1950年结束。而这个时期正是天津酿酒业非常发达的时期，加之天津酒业公所和天津酒业同业公会在这一期间先后成立，从这两个天津烧锅业同业组织的相关文献中，能够发现较多的津酒史料。天津档案馆馆藏的津酒史料，内容丰富，翔实可靠。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近代津门酒业的发展规模、酒业同仁与政府间关于酒税及其他捐税问题的交涉、天津烧锅业参与近代政治活动、天津烧锅业参与当时的国内外博览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这些资料弥足珍贵，是研究近代天津烧锅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此外，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历史档案》中，也经常刊登关于清代地方政要关于酿酒业的各种争论，这些文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时华北地区区域之间的经贸交流和酿酒业的宏观分工。八国联军在占领天津期间，曾经组织了一个殖民统治机构，名为都统衙门。在该衙门召开的会议中以及会后发布的各种告谕中，对烧锅业的各种征收捐税的政策多有涉及，能

够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社会转型时期天津烧锅业所面临的各种苦难。此外,在天津津酒集团档案室中,馆藏有该集团创建早期的珍贵文献。这些档案资料,为我们梳理20世纪50年代初期天津酿酒业的情况,尤其是近代天津烧锅业的最终归属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权威的史料来源,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濒临消亡后再获重生的天津酒业的历史进程。

(二)地方志及古代文献类。关于天津的地方志,目前现存最早的是康熙年间出版的《天津卫志》,后来逐渐编修的乾隆《天津府志》、《天津县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天津县新志》、《天津政俗沿革记》、《天津志略》等多部志书。在这些地方志,有的对天津酿酒业提纲挈领地指出概况,有的则详细记载了天津酿酒业的发展规模、烧锅业的分布和天津酒业同业公会的具体情况。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时期,几位近代中国较为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曾经担任过直隶总督,如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在他们的文集中,也有关于酿酒业的文献留传,不过大多是对酒税等问题的政策性奏折,较为重要的是李鸿章在光绪四年撰写的《请禁烧锅片》和袁世凯的几篇关于征收酒捐和酒税的文献。虽然这些文献大多是宏观的描述,但对当时天津酿酒业的发展影响深远,或是限制酿酒业的发展,或是让天津酿酒业背上了沉重的税捐负担。此外,在《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清实录》等研究古史必备的文献中,对于元明清三代政府规定的各种酒捐和酒税记载尤详,对于我们梳理和认识这三个朝代政府对酿酒业的态度、天津酿酒业发展所面临宏观历史背景帮助良多。在《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续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世文四编》、《皇朝经世文五编》等书中,保存着清代从中央到地方及地方精英关于“禁烧”、“开禁”等相关论述。尤其难得是,在这些文献中包含一部分涉及华北地区酿酒业的制造工艺、发展水平的资料,对于认识清代前期天津烧锅业的发展很有裨益。